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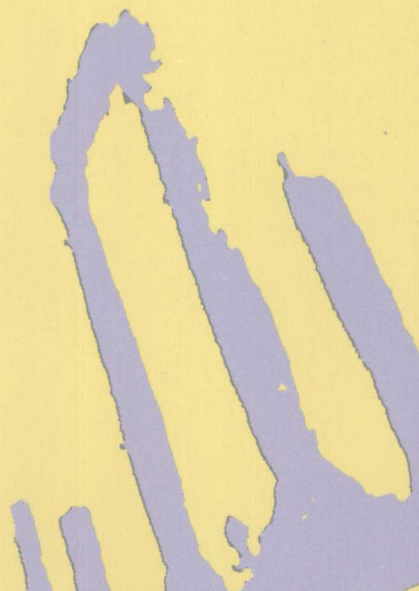
塔西佗和他的历史世界

帝国 的 沉沦 与 救赎

褚新国 著

The Degeneration and Salvation of Roman Empire:
Tacitus and his History World

 人民出版社



K126
49

本书承蒙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
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
资助出版 特此致谢

帝国的沉沦与救赎

——塔西佗和他的历史世界——



褚新国 著

本书为2008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古罗马史学专题研究”学术成果

责任编辑:贺 畅

责任校对:刘越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的沉沦与救赎——塔西佗和他的历史世界/褚新国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

ISBN 978-7-01-007093-3

I. 帝... II. 褚... III. 史学史:思想史—古罗马 IV. K091;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2016 号

帝国的沉沦与救赎

DIGUO DE CHENLUN YU JIUSHU

——塔西佗和他的历史世界

褚新国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7-01-007093-3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址:www. peoplepress. net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塔西佗史学和他的历史学家地位 (代序言)	1
导 言	9
第一章 塔西佗史学的生成背景	47
第一节 共和末年与帝国初期的拉丁史学	49
第二节 道德存废与国家兴亡	60
第三节 哲学社会思潮的主要动向	69
第四节 变乱中的学术人生	79
第二章 塔西佗的循环史观	91
第一节 光鲜与强悍中的憔悴	94
第二节 退化抑或进化	106
第三节 循环往复中的没落与败亡	116
第三章 塔西佗的天命观	127
第一节 学人的传统理念	131
第二节 在道德沦丧的境遇下	135
第三节 天灾与人祸	143



第四节	何以安身立命	149
第五节	命运、人性及其他	159
第四章	塔西佗的历史叙事	167
第一节	关于体裁与题材	172
第二节	偶然中的必然：小事情与大问题	182
第三节	求同存异中的独创	190
第四节	“通识”意趣：狭促抑或恢弘	200
第五章	塔西佗历史写作的特征	215
第一节	“值得”与“不值得”	220
第二节	定善恶之实	233
第三节	客观公允与爱憎之见	244
第四节	细部的真实	259
结 语		276
参考文献		293
后 记		333

塔西佗史学和他的历史学家地位

(代序言)

说起西方著名的古典史家，塔西佗大概是少不了的。不是吗？连对他的史学不无曲解的柯林武德也这样说道：

李维和塔西佗并肩而立，成为罗马历史思想荒原上的两大纪念碑。^①

的确如此。由此我们进而认为，塔西佗不仅在古罗马乃至西方史学发展史上，都是一位“纪念碑”式的人物，其史学业绩不容忽视。在我看来，塔西佗史学的如下几个方面应当引起关注：

从古罗马史学的特征来看。

20 世纪以来，在一些世界文化史之类的著作中，“扬希抑罗论”日见张扬，“罗马文化无创造论”渐渐滋长，其中尤以美国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的论见为甚。在汉密尔顿看来，希腊与罗马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说两者具有共同的特征不啻为一种“神

^① 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 45 页。



话式的虚构”^①。这种“扬希抑罗论”在史学上也有所反映，如现代美国史学史名家绍特威尔在他的名著《史学史》一书中声言：“罗马在历史写作方面的成就微不足道且令人失望。”^②即使是柯林武德在上述褒扬塔西佗的言论中，也还是称罗马历史思想为“荒原”。

我对于上述这些见解难以苟同。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我以为论者是以希腊之长来衡量罗马之短，忽视了希腊与罗马自身的特点，因而看不到由这种特点而酿就的文化上的（包括史学上的）各自特色。个人以为，西方的古典文化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共同创造，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两者所属的古典奴隶制社会及其生产方式作用于上层建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的结果，因而其文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便成了西方古典文化的共性。但历史研究在关注事物共性的同时，更应寻找它们的个性，即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光辉的希腊，伟大的罗马”，这一流行习语倒是很形象地说明了希腊与罗马的不同特点，故前者成了荷马与苏格拉底的故乡，而后者则为恺撒与奥古斯都的叱咤风云提供了历史舞台。

毋庸置疑，希腊文化在纯文化的各个领域确有开创之功，但文化的创造性成就，也需要借助后人的传承方能发扬光大，泽惠后世。罗马人初而仿效，继而全面继承了希腊人的文化遗产，终于根据其自身的特点在若干领域内作出了出色的创造。因此，拜希腊人为师的罗马人，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它的老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其突出表现就是它的政治文化，而这已成为罗马人留给后世的一项主要遗产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

^① 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徐齐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② James T. Shotwell, *The History of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p.255.

而持久的影响。“学生超过老师”，换言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不乏先例。

罗马政治文化的这一特点充分反映在罗马史学上。罗马文明的表征是坚忍不拔而非深闺弱质，罗马人所追求的是力量而非“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个人抒怀。罗马人的理想实现之日也就是罗马民族精神的高扬之时，一部罗马文明史，道尽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历史沧桑。试问，植根于罗马政治文化深厚土壤中的历史学家们，从罗马史学的奠立者老伽图到罗马大史家塔西佗，又有谁能置之度外而不深受其影响呢？

是的，塔西佗史学所体现的特征，明显地反映了古罗马史学所赋予的强烈的政治色彩。从塔西佗的著作来分析，一方面，他的笔端直指暴政，揭露帝制，鞭挞暴君。在他的笔下，提贝里乌斯的残忍、尼禄的荒唐等一一还其本相，帝国宫闱的一幕幕丑剧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厉笔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罗马暴君。后世论者称塔西佗为暴君的敌人，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便令一切专制暴君和独裁者胆战心惊。可见，塔西佗的历史著作打在罗马暴君的身上，却痛到了后世一切专制暴君的心上，以至俄国诗人普希金称他的著作为“惩罚暴君的鞭子”。如果徜徉在塔西佗的历史世界里，读者诸君一定会对普希金的这一名言有所心得，有所体会。

另一方面，塔西佗歌颂共和政体，赞美昔时的世风淳朴，留恋旧贵族共和派人士的自由生活。罗马从共和发展到帝国，世风日下，今不如昔，“友谊被看成是一种危险的暗礁；讲真心话被认作冒失的行为，美德则只不过是可以在人们心中引起回忆往日幸福的一种矫揉造作的表现罢了。”^①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

^①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5页。



鸠在 18 世纪的这段名言，无须在此添加说明，不是对塔西佗所描绘的多彩的历史世界的一种深刻的历史反思吗？

这便是塔西佗的历史理念，正是通过上述所说的一褒一贬，集中地传达了的社会政治史观，他的史学让人们看到了古罗马史学所具有的这种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一点，在最卓越的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所叙述的历史世界里是难以看到的。正是在这一方面，褚新国以他的论述，帮助人们在塔西佗的历史世界里窥其原貌，从而有助于我们对罗马史学整体特征的把握。

从塔西佗史学本身来看。

我们在这里必须再次提及柯林武德，他以批判的历史哲学派的眼光审视塔西佗史学后，对他的历史学家的身份持怀疑态度，并认定“塔西佗系统地歪曲了历史”^①。柯氏之见难以与塔西佗史学的真相相符，故此论亦值得商榷。

在历史写作上，塔西佗传承了古典史学中的求真探索精神。这种求真精神由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开其端，而由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集大成。到了塔西佗那里，则是有所继承，有所弘扬，并形成他自身的特点。

塔西佗是一个有良知且十分严肃的历史学家，他恪守前辈史家“求真乃史家首务”的写作理念，在他的代表作里公开表白：“我下笔的时候既不会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②，又说“在写到任何人时都不应存个人爱憎之见”^③。塔西佗信奉的这种“客观主义”的历史理念是难以实现的，他所渴望的“求真”，正如新国在书中所述论的，塔西佗的求真意识主要包括这

① 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 44 页。

② 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 2 页。

③ 塔西佗：《历史》，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 2 页。

样两个含义：“事无巨细”意义上的“善恶必书”与相对客观公允的人事评价，即要达到“秉笔直书”与“惩恶扬善”的有机统一。从而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塔西佗史学的求真精神，也间接地回应了柯林武德之流对塔西佗史学的曲解。

塔西佗的史学方法也有可取之处。他认识到掌握第一手史料的重要性，因而想方设法搜集资料，并利用自己位居帝国政府的高位，充分运用当时的官方档案文献。他还亲自外出进行采访与调查，以获取事件目睹者的见闻。塔西佗对所获史料是经过认真筛选的，不消说，这种取舍也不可能是“客观主义”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从不故意歪曲乃至捏造史料，即使是对某些痛恨的专制暴君，也不轻易相信那些加在他们身上的丑闻，采用的说法都是经可靠的权威证实过的。遇到相悖的材料，他不轻易评断；对于不可信的材料，或持疑义，或直抒己见。

事实证明，塔西佗的历史著作至今仍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尤其是他的《历史》、《编年史》构成了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时代的风云变幻的历史长卷，无疑仍为我们当下研究罗马古史之权威史料。倘轻易地否定了他的著作，并认为在那里“系统地歪曲了历史”，那是有失公允的。

新书书中论及塔西佗史学，不外从他的历史观（第二、第三章）和史学观（第四、第五章）着墨的。在论证中，辅之以翔实的中外文献资料，因而言之有据，疏远空议，是能够以此服人的。

从西方古典史学的发展路径来看。

对于西方古典史学的发展路径，前面说到的绍特威尔倒有一段话说得很到位：“从李维到塔西佗，犹如古希腊史学中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的演变。”^①从这段评论来看，我觉得塔西佗

^① James T. Shotwell, *The History of History*, p.301.



确实可以与修昔底德相媲美。

塔西佗是最伟大的罗马史学家，而修昔底德公认为最卓越的希腊史学家，两者有可比性：

他们都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对所写的人与事，均能观察入微，因而他们所描画的历史世界，无不引人入胜，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和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

他们都在用一种悲观主义的调子来写历史。修昔底德随撰史之进展，怀念伯里克利时代之盛世，写至雅典临近失败时，真是满腹凄怆，不禁为之黯然神伤，塔西佗书中悲天悯人的情怀也许比他的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在文风上也很相近。两者都崇尚简洁概括，执意追求文字的精炼与表现力；两者都留意对人与事作出种种心理分析；两者都喜欢在各自的著作中代撰演讲词，其用意与手法也如出一辙。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塔西佗与修昔底德的著作一样，都属于政治史范型。从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来看，政治史范型是修昔底德奠定的，这一范型发展至塔西佗而有大成，直至19世纪的兰克史学达于顶峰。

行文至此，塔西佗史学及其史家之地位已昭然若揭，当代西方史学史家指出：“塔西佗作为历史学家的声誉和他在史学上的伟大成就是不可动摇的”^①；塔西佗的挚友、古罗马作家小普林尼早就预言他的英名将与世长存。^②对此，再也用不着我在这里饶舌了，新国的这本著作的问世，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吗？

^① P. Gay & G. J. Cavanaugh (edd.), *Historians at work* (Vol.1),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2, p.205.

^② See M. Grant, *The Ancient Historians*, New York, 1970, p.401.

关于塔西佗史学，我确实是比较早就予以关注了。大约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上海市历史学会的年会上，就“试论塔西佗史学”为题作过学术报告，这就是四年前经修改而公开发表的那篇《“惩罚暴君的鞭子”：塔西佗的社会历史观及其他》的文章。^①就我个人而言，从对一篇旧文的“眷恋”而历久不忘，也许只能用“塔西佗情结”可以说明，它归之于塔西佗史学自身的魅力，归之于塔西佗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上的重要性，以及个人对西方古典史家自大学时代以来就形成的偏爱。现在好了，就像易兰来续我的兰克史家研究^②一样，新国也来续我的塔西佗史研究了，而且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帝国的沉沦与救赎——塔西佗和他的历史世界》一书是国内塔西佗史学研究的新突破，也是对西方古典史学和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贡献。

作为新国的老师，我自然对他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然而，回顾他的成才之路，也深感为学之艰辛和不易。当然，艰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困难面前的退却，慵懒怠堕，不思进取，从而失却了信念，迷失了方向。如同一叶孤舟，在茫茫大海中随波逐流，看不到航标，怎能到达理想的彼岸？新国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在艰辛的道路上，他一往无前，且看：他的报考，充满艰辛，数度不改初衷，志在必得；他的读书，充满艰辛，屡屡攻克难关，从不畏惧；他的写作，充满艰辛，反复琢磨修改，追求卓越。

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这位农家子弟爽直而又狷介的个性，与学府深院弥漫出来的“贵族气派”的碰撞。他初来申城，

① 载《河北学刊》2003年第1期。

② 易兰博士的学位论文《兰克史学研究》，已列为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乍到复旦，“在异乡听雨看云”^①，总觉得不像在家乡那么自在，犹如公元1世纪时的“外省人”，走在熙熙攘攘的罗马城内，被那些自以为是的“罗马公民”们投来了鄙夷的目光，半是尴尬，半是惊怵。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海纳百川的大上海接纳了他，兼容并蓄的复旦园融汇了他。可以这样说，艰辛锻炼了他，也造就了他；复旦艰辛的求学之路，更留下了他自己所说的“复旦生涯”。换言之，每一个在复旦读过书的莘莘学子们，都留下了他们生命旅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章，岂能是淡然的一笔而遗忘！因为这一章把过去的时光与将来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内在的联系，将会谱写出今后人生的璀璨与辉煌。不是吗？我校我系学友方永刚的人生轨迹就是最好的见证。^②

欣逢新国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将出版，他要我为他的书写个序，于是欣然命笔，写了以上一些话，还不知道正确与否。末了，我还要说一句的是，希望新国恪守“谦虚治学，谦虚做人”的“祖训”^③，继续努力，不骄不躁，为学术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是为序。

张广智

2007年8月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① 此句借用葛兆光先生的书名《在异乡听雨看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方永刚，是复旦大学历史系1985届毕业生，党的创新理论的优秀传播者。

③ 这里所说的“祖训”，乃指我研究生时的导师、前辈历史学家耿淡如先生（1898—1975）生前对我的教诲。另参见拙文：《耿淡如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载《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导 言

塔西佗 (Tacitus, 约公元 56—118 年) 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 白银时代拉丁文坛出色的修辞学家, 同时也更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对于一个经邦治国者来说, 品评历史主要是为了务实致用。在塔西佗具体的学术实践中, 无论是体裁的广泛性抑或题材的丰富性, 皆体现了他于相关领域持续不辍的探索和尝试。在此意义上, 塔西佗的传世之作共 5 部: 首部作品《阿古利可拉传》(*De vita Iulii Agricolae*) 大约创作于公元 98 年, 是缅怀岳父阿古利可拉的一部人物传记; 《日耳曼尼亚志》(全名《论日耳曼人的起源、分布地区和风俗习惯》, *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 于同年写就, 记载了罗马帝国时代早期散居莱茵河、多瑙河一带的日耳曼诸部落情况; 《关于演说家的对话》(*Dialogus de oratoribus*) 大约公元 98—102 年间成书, 探讨了演说术在帝国衰落的原因且



颇具西塞罗文体风格(Ciceronian)^①;作为首部真正的历史作品,《历史》(*Historiae*)大约完成于公元109年;最为成熟的史作《编年史》(*Annales ab excessu divi Augusti*)则基本与之相当,并在约公元116—117年间发表。^②

毋庸置疑,塔西佗身兼文学家、演说家、政治家、道德家等多重立场从事撰史活动,其作品无限丰富的历史内涵也为世人从各种视角进行解读提供了充分可能。长期以来,人们总是热衷于将复杂矛盾的塔西佗打上形形色色的标签符号:或持身守正言行如一的道德哲学家,或共和政治的盲目崇拜者,或鼓吹罗马至上的帝国主义者,或历史学家中最伟大的心理学家,或马基雅维利主义者(Machiavellian)。除此而外,他还分别被冠以“谎言家”、“流氓”、“反基督教分子”、“反人道主义分子”、“大国沙文主义分子”、

① 比较参看[古罗马]西塞罗:《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在此意义上,该书主要包括如下章节——

“论公共演讲的理论”(第1—138页),“论开题”(第139—267页),“论最好的演说家”(第268—277页),“论题”(第278—309页),“论演说家”(第310—570页),“论演讲术的分类”(第616—656页),“布鲁图”(第657—770页),“演说家”(第771—853页),等等。

② 塔西佗传世作品除《关于演说家的对话》而外,现皆有中文译本——

《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历史》,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编年史》,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以下凡相关引文皆引自是书,凡着重号皆为笔者所加。另外,拙著学术史部分借鉴了相关书评(因版式要求集中于“参考文献”),特此声明。

Cf. Kelly Boyd(edd.), *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2vol). London &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9, pp.1169—1170; D. C. A. Shotter, “The Starting—Dates of Tacitus’ Historical Work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Vol. 17, No.1. (May., 1967), pp.158—163; B. Walker, “A Study in Incoherence: The First Book of Tacitus’ Histories”,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71, No. 1. (Jan.,1976), pp.113—118.

“王权掘墓人”等形形色色的“荣誉称号”^①。无论如何就一般而言，塔西佗作为拉丁史上一位天才甚至最伟大文学家的地位几乎无可置疑。然而，关于他是否可以作为一位同样卓越的历史学家却颇具争议。譬如在麦考莱(Thomas B. Macaulay)、泰纳和西姆等著名学者看来，塔西佗在古代罗马历史学家中绝对是最伟大的，堪与希腊的修昔底德相媲美。或认为，塔西佗作为历史学家的声名虽时而放大时而衰减，但理应同撒路斯提乌斯、李维等一起列于罗马最负盛名的大家当中，其影响和地位应当接近或稍在二人之上。反之，则对其严辞抨击。更有甚者，塔西佗的史家身份竟也惨遭质疑。大体说来，学界分歧主要在于塔西佗撰史的“真实与否”。实际上，自古以降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皆对此分歧迭起：或“塔西佗作为一位秉笔直书的历史学家毫无疑问是最伟大的”(Froude 语)，或“一无是处而未必尽然可信”(Bacha 语)，等等。^②

① 譬如，有论者(Jürgen von Stackelberg, *Tacitus in der Romania: Studien zur Literarischen Rezeption des Tacitus in Italien und Frankreich*, pp.xii+298.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60.)主要关注于：塔西佗同时代人对其作品的赞誉，历经长达 1200 余年的衰落时期，在 15、16 世纪的重新现世，以及随之而来的意、法学者(从马基雅维利直至拿破仑时代)对其作品的理解和接受情况，等等。在此意义上，15 篇著名学人有关塔西佗作品被接受情况的研究论文构成全书主要内容；在近代西方恰值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社会领域急剧大变革的时代，当各家各派在引用塔西佗作品用以讨伐他人而捍卫己说之际，却往往亦有某些思想火花甚或真知灼见隐于彼此的交锋对峙之中。换言之，从塔西佗作品及其思想被接受情况的承接流变史中，我们或可充分领略到一部欧洲近代史(尤其主要是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博大精深和风云际会。

② 事实上，这一点在西方学界长期以来一直饱受争议。譬如，通过“共和理念”(Die Idee Der res Publica)、“权利角逐”(Die Machtstruktur des römischen Staates und der römischen Gesellschaft)和“道德意识”(Das sittliche Bewusstsein)三个组成部分，有论者(Hans Drexler, *Tacitus: Grundzüge Einer Politischen Pathologie*, pp.200. Frankfurtam-Main: Verlag M. Diesterweg, 1939.)主要研究了塔西佗笔下的罗马社会，并倾向于将之视为真实的公元 1 世纪罗马历史。尤其是自二战以后，泰纳(Taine)、西姆(Ronld Syme)、(转下页)



概而言之,较于其他的拉丁作家,千百年来塔西佗似乎总是享有世间最多的赞誉和非难,这一点即使从其作品“命运多舛”的传播流变史中亦可略见一斑。挚友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早在当时即预言塔西佗的作品必当不朽(*Epistles*, 7, 3),然而并非李维般幸运地瞬间声名鹊起乃至家喻户晓。在狭小的朋友圈中著述虽被视为上乘之作,但稍后帝国有关他的论载或只言片语或语焉不详或干脆不足为信。突出表现在人们对缩写李维的鸿篇巨制乐此不疲,却鲜有以类似功力作用于塔西佗者;公众的阅读情趣开始转向纯粹的传记化写作,于是苏维托尼乌斯史学应运而生。尽管大量零散证据表明,中世纪并未将塔西佗完全遗忘——譬如加洛林王朝(the Carolingian age)偶尔也会诵读其部分作品,只是相关的手抄文本少之又少。《历史》与《编年史》的留存于世,竟然全赖中世纪一孤本式的手抄文本——幸亏在意大利美第奇家族法典(*the Medicean codices*)中保存有《编年史》第一至六卷和第十四至十六卷,以及《历史》前面的部分章节。否则,塔西佗的作品甚或

(接上页) 马丁(Ronald Martin)和迈勒(Ronald Mellor)等著名学者均予以高度肯定和积极评价。相反,亦有学者提出了驳斥性观点。譬如,有论者(Par Eugène Bacha, *Le Génie de Tacite: la Création des Annales*, pp.324. Bruxelles:H. Lamertin;Paris: F. Alcan, 1906.)指出《编年史》等只是滑稽荒唐夸大其词的虚构文学,塔西佗更多意义上应当被视为一位谎言家和诗人。此外,沃克(B. Walker)、伍德曼(A. J. Woodman)等学者也坚持类似的意见。

更多相关内容,比较参看下列著述——[美]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2页;[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5页;James T. Shotwell, *The History of History*, pp.xiii+40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p.301, pp.314—315; M. L. W. Laistner, *The Greater Roman Historians*, PP.viii+196. Berkeley &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123—129, p.139; Kelly Boyd (edd.), *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p.1169; Michael Grant, *Greek and Roman Historians: Information and Misinformation*, pp.xiii+486.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98; K.Wellesley, “Can You Trust Tacitus”, *Greece & Rome*, 2nd Ser., Vol. 1, No. 1. (Feb., 1954), pp.13—33.